

澳華新文苑

第1136期

她那顆星永遠光耀

王文



高耀潔醫生 (1927-2023)

12月10日，被譽為「民間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潔醫生於紐約去世，享年九十六歲。

她曾在2003年榮獲「感動中國十大年度人物」。如今圍繞在她身上的，是有關艾滋病防治與救助專家、婦科腫瘤病專家等榮譽。她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被美國《時代》雜誌評為「亞洲英雄」，還獲得過全球女性領袖獎、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拉蒙·麥格塞公共服務獎」以及聯合國頒發的救治艾滋病獎章……

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在她的祖國，高耀潔醫生背負「國家罪人」的罵名。獨居美國的她，承受與親人恩斷義絕的現實。老伴早已辭世，兒女拒絕認她，也把她視作「流亡海外的叛徒」。兒女在家書中寄來錐心之語——「你在走讓國人譴罵的路，你繼續這樣折騰下去吧，你將在孤獨寂寞中死去。」這是孩子們寄給她的最後一封信，從此之後，大洋彼岸的家人不再給她任何音訊。

被孤獨與痛楚纏繞的寫書時光，寂然而漫長。每每想起不肯再認她的兒女，和那些無辜赴死的艾滋亡靈，高耀潔醫生都會心痛得從噩夢中驚醒。

清醒的時候，她的生活已經簡單到了極致，每天一餐飯，吃點麵條、豆腐等便於消化的食物。不是身體痛到撐不住，也不會上床休息。

在異國他鄉的逼仄角落裡，所有的時光，全部投入了寫書的進程中。對於高耀潔醫生來說，寶貴的已不是金錢，而是尚有一口氣在的時候，可以記錄與發聲的時間。她含淚泣血，筆耕不輟，只為撕開權極力遮掩的醜惡面紗，讓更多人瞭解那段為人知的慘痛過往。

她的心志如青松明月一般高潔。「我生前的建樹和去世，不該成為他人沾名釣譽的工具。」——這是她的遺囑。

每當人們抬頭望天，都會看到，在那遙遠璀璨的星空中，有一顆被命名為「高耀潔」的小行星在悄然運轉。她那顆星永遠光耀……

在讀完《嬗變：「四十千」紙上足跡三十年前言》後，我陷入了一場時光的漩渦，被文字帶領穿越三十年的滄桑歷程，感受著歲月的流轉。同時也有了想寫一點自己的感受和贊嘆的衝動。

我是1993年6月來到澳洲的。回溯到1993年11月1日，澳洲政府宣佈關於「四十千」中國留學生因「六四」事件而滯留澳洲的決定，我正巧趕上了這趟末班車。這一歷史瞬間，如同一幅「悉尼流浪圖」的畫卷，勾勒出「歲月無痕 大地留印」紀念系列活動的深遠背景。這是一場對移民歷史的莊重回顧，將我們引入那個特殊而迷茫的年代。

這個系列活動旨在彙報並向澳洲社會展示「四十千」移民三十年來的經歷和成就。作者通過精妙的筆法，將他們的故事鑲嵌在澳洲移民歷史的宏偉畫卷中。文章以平凡而熱愛澳洲的華人為主角，深情地描繪了他們在這片土地上的扎根、成長、開花的歷程。

「歲月無痕，大地留印」這個主題，如同一場溫暖的交響樂，引領我們共同聆聽那些年華飄逝的旋律。以「

人們學著沉重的鑰匙敲著歲月」表達了時間的無情，歲月劃過人生處處留下傷痕，而心若與歲月的質量一致，將毫無瑕疵。這是對時間與人生的深遠思考，如同一場心靈的對話。

以《嬗變》為書名，對「四十千」留學生三十年紙上足跡進行了詳實的追蹤，發現與評介。紙上足跡，即是這一代人在嬗變中表現出的掙扎、進取、成功的文學藝術作品。這一部分如同同一場文學之旅，讓我在每一篇文字中感受到他們堅韌的靈魂和對夢想的執著。

作者以個人關注與致敬之情，將這一系列活動結晶為一部書。在書中，他提到作為華裔移民文化人，應該懷抱對中華文化的信念，為澳洲多元文化添磚加瓦。這是一種自豪的宣言，也是對自由的追求和文化源頭的探索。

讀完這篇文章，我彷彿在穿越時光的隧道中漫遊。感謝作者分享這段珍貴的歷史，讓我與「四十千」留學生們一同跨越三十年的風雨坎坷，並期待未來更多的文字作品和精彩的傳奇。

《嬗變》前言有感

晉夫

11月11日，是我在疫情結束以來第一次參加何與懷博士一如以往地在悉尼Rockdale樂調圖書館三樓會議室舉辦的澳華

寫在《嬗變》研討會之後

石子

文學講座，這天有淳子女士、劉放老師、何丹尼先生、蔣行邁老師這四位文人大咖為主要發言人。

第一位發言的是淳子老師。這是我第一次聽她演講，她的聲音圓潤柔美，著裝優雅時尚，演講內容立意新穎獨特，由此可見她的學底蘊深厚，邏輯思維縝密，不愧為著名的女作家！她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文藝編輯、上海史研究員、張愛玲研究專家、復旦大學海派文學社副社長，也是上海東方廣播電台主持人。

第二位發言的是劉放老師。他這天雖然聲音沙啞，但是依然保持著一位資深老文人的獨特深遠的文學見解。劉老師是廣東興寧人，1982年畢業於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同年起在《花城》文學雜誌任編輯。他1988年移民澳洲悉尼至今。去年5月底，我第一次和他們夫妻倆在Campsie 圖書館見面的時候，我們一見如故，曾經用客家話愉快地交流過。去年我還有幸被他現場抽籤抽到了我的號碼，獲得了他現場贈送的新書《為了那傳說中美麗的草原》。我回家拜讀完他的大作之後，還讓先生和我一起驅車前往小說中寫到的悉尼養老院呢！劉放老師去年曾經告

訴過我，他在暨大讀書的時候，與已故著名詩人汪國真先生是大學同學和舍友。

第三位發言的是何丹尼先生。我以前曾經聽過他好幾次在這個會議室裡召開的文學講座中的發言。他的聲音高亢洪亮，有趣的是他這天拿著麥克風，卻不用它。這天他還是不改他一貫犀利點評的風格。他還簡明扼要地重點分享了澳華作家齊家貞的三部優秀的文學作品，也是讓我著實開了眼界！

第四位發言的是行邁老師。他和何博士一樣，都是我們兩軒詩社德高望重的文學顧問，他們一直都是這樣文質彬彬、慈祥和藹、平易近人。這天得知行邁老師比何博士年輕三歲。行邁老師的演講風格是我所喜歡的，他總是保持著激情滿懷、既熱切又理性的演講風格，每一次精辟獨到的見解，都能引起觀眾席上的掌聲雷動。今天他直抒胸臆，大膽表達了自己對普世價值和澳洲多元文化的獨特見解，讓我受益匪淺！

行邁老師的演講總是這麼擲地有聲，令人信服！今天何博士講話比較少，但是依然神采奕奕，笑意盈盈。我很久沒有這麼投入地聽一次現場的文學講座了，今天算是盡興了。感恩！謝謝何博士的通知！

耀潔明星墜，聞之倍愴神。
金方祛急疾，妙手救孤貧。
血禍憑誰問？中州吹哨人。
良知堪景仰，百世頂仁仁。
張青敬挽

高耀潔，這世界不配你如此乾淨的人

唯真

“他是我在黑暗中迷失的月光，是在寒冷中顫抖時的暖意。他的心中滿是這世界配不上的善良。我對他的愛超越了測量和理性”。

讀起這樣的詩句想到了你

九十六年生命長河
一滴水一個浪波緩慢急流翻滾
污濁黑過你的身體被染成一股清流

卑鄙蟻蟻生過死去
悲傷的大地生命無痕
誰見過兩歲的生命用僅有的語言喊出一句
下來吧
吸吮著一隻僵硬的腳趾
永遠不知道這腳趾的人是死去的雙親
他們用自己的雙手
結束等淨死亡的生命

垂危在苦難的繩索下
我的眼淚滾成你生命的長
年月計算腳步走過的路
計算快樂與悲傷
計算向往與無奈
計算人性與算計

救死扶傷在醜陋的靈魂下是腐爛的詞句
而你從不計算
把時間用成金子
用金子購買生命
可有誰懂專你付出全部

閃爍的星刻下你的名字
在無痕的太空永遠閃亮
你走了
帶走了萬千個慶賀萬千腳印
直到宇宙不再存在

高耀潔醫生在她生命最後的日子裡。



世界因你來過而潔淨
世界不因你來過而不污
先是閃電劃破夜空
雨落卜便是黑暗
長夜看不到人間醜陋
謊言與利益
貪婪與無恥
你是真空的花不會凋謝

我留住你的曾經
看天上的星星
可是可是呀
我無法揮去
這世界不配你如此乾淨的人

通向自由之路——從《嬗變》一書說起

行邁

我想從何與懷的新書《嬗變：「四十千」紙上足跡三十年前言》說起，結合個人的經歷，談談我們中國大陸新移民通過三、四十年的「嬗變」在澳洲落地生根的感受。

《嬗變》一書的封面插圖像是一面牆的縮影，左邊是紅色，右邊是藍色，比喻了四十千中國留學生的人生和價值觀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了從紅色到藍色的嬗變。這也意味著「四十千」作為「六四」的難民，已經擺脫了精神上的枷鎖，通向自由之路。

我1985年來到澳洲，取得悉尼大學獎學金後成為一個四十一歲的高齡留學生。從那以後的三十多年中，我見證了四十千留學生發生嬗變的全過程。這不僅是指紙上文學作品反映出來的變化過程，還包括生活以外的，在社會生活裡見證到的變化過程。我把留學生群體這種整體性和代表性的變化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我們在清貧的生活中賣力地學習和打工，對自己的前途並沒有確定的設想。有人忙於重建家庭，有人拼命打工攢錢，有人參加了為留學生爭取居留的活動，有人熱衷於華文寫作及華文報紙刊物的發表。在進入新世紀前後那幾年裡，澳洲，特別是悉尼的華文報刊雜誌出版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熱潮。這包括須花錢買的週刊和半月刊。在這眾多的出版物裡，反映了留學生生活的艱辛，思想情感的多元化和不同的人生經歷，以及對澳洲社會的陌生感與不同文化的碰撞。我於1997年曾在《滿江紅》雜誌發表一篇散文，叫做《川江的號子和牽夫的腳印》，內容就是表現留學生在艱難環境下砥礪前行的精神。

我們還在紙面之外，還見證到許多活生生的，有思想有道德的活動與故事。比如，支持團結的活動，聲討珀琳韓森——國慶反亞裔移民的活動，在澳洲努力參政的活動，以及紀念六四運動、批判故國官場的腐敗和

政治倒退等等。記得我有一次聲討珀琳韓森的集會上初遇到華人社會活動者陸峰，之後我們發起成立了大陸新移民團體聯合會「澳華聯」，並創辦了澳華聯的華文刊物，由女作家施國英擔任主編，發表留學生的生活現實、思想感受及人生訴求。我在首期的專刊上發表了散文《我在澳洲打官司》，以個人經歷為例，提示新移民在澳洲要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尊嚴和利益。

第二階段的特点是，我們的大多數已獲得澳洲公民身份，另一部分也取得了綠卡；我們不再糾結於未來會在何處安身立命，而是明確把自己的未來寄托於澳洲，都著力於創建在澳洲的家園，並逐漸有了在澳洲出生的下一代，或已經把愛人孩子從中國接到澳洲。不過，我們對中澳兩國的認知和對自己從小獲得的教育發生著糾結。以我自已為例，1985年出國時，我想的是留學回國之後在醫學研究中報答祖國人民的培養。幾年後，我在悉尼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並貸款買了房子，兒女也都在悉尼讀書，這時我便意識到，我的家從此都會在澳洲發展了。那麼我如何擺放在故國和新國之間的位置呢？

為了實現自己報效祖國人民的心願，我和國內醫學單位建立了長期的科研合作，共同開辦生物醫學，並幫助國內大學培養研究生。然而，我對故國那種強權專制的社會制度、在特別權力下的特別腐敗，以及不公正和不文明的社會風氣已經感到格格不入了。我在內心已經發生了改變，決定留在澳洲這片新天地裡，按自己的心願去生活和工作，做一個身心自由的人。這是一個選擇的階段，相

信整個留學生群體，都和我一樣經歷了這樣的階段。

到了二十一世紀，「四十千」大致進入了嬗變的第三個階段，基本實現了三個穩定，即我們逐漸有了穩定的工作，有了穩定的家庭，又特別是有了穩定的私有財產，這使得我們的思想認知發生了質的變化。

有一個被譽為啟蒙哲學和自由主義之父的人，他就是十七世紀的英國人約翰·洛克（John Locke）。洛克提出，「私有財產產生道德，人類在道德的基礎上產生合作、交換、契約、慈善這些秩序，秩序是人類文明的基石，根源和驅動力。私有財產權是人類文明的標誌。」如果是四十歲以前的我，對這些話是不可能理解的，而到了我有了個人事業和財產時，才理解到契約、法治、平等和公平的重要性。我每年努力地工作，按期繳稅，遵守法治和社會秩序，虔誠地參與各種選舉投票，並盡力做一點對公眾有益的事情。若把這些歸結為一點，那就是在民主制度下做一個自由人，那就不但有著自由權利，同時也有著讓他人也自由的義務。

在我出生的1944年，二十世紀著名思想家之一的哈耶克發表了《通向奴役之路》。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政府官員關心的必然是如何增加自己的地位和財富，而通過這些目的就只有在通過專制乃至暴政。而人民為了保護個人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就必須對政府進行監督和抗爭。」

上述先賢們的思想話語，在這幾十年中整理了我以對人民和政府的糊塗認識，也概括了我如今已經定型的思想與思想。簡要地說，在我的故國，許多以馬克思主義自詡的權貴，他們嘴裡講的是共產主義，而腳板下青睞的卻是資本主義和所謂

的帝國主義；他們滿嘴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一邊宣揚消滅私有制，一邊卻瓜分資源，撈取權利和金錢；他們的貪腐隊伍和貪腐規模都隨著時間在成倍地增長。在他們的帶動下，全民向錢看，人人盤私利；人告人、人整人；食品不安全，道德見淪喪；互害模式可持續發展，專制制度不間斷完善；國家經濟下滑，人群骨質酥鬆……把一個大好的國家搞得烏煙瘴氣。這不正是一條通向奴役之路嗎？

相比之下，澳大利亞雖然也有自己的問題，但實行的憲政制度，落實的是一人一票；腐敗很困難而懲罰很嚴厲；公正不空談而且見諸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民醫保，食品安全，環境美好，社風純正；個人的尊嚴能得到尊重，私有的財產能得到保障。

到這個時候，那些關於共產主義高托邦的謊言不再能欺騙我們，我們對自己和子孫孫的追求比任何時候都清楚，也都堅定不移。我們心底裡那種血色的仇恨已被抹平，我們胸中那種湛藍的大愛早已滋長；我們腦海裡的對錯與是非日益明確，我們看世界的眼光不再渾濁。正如哈耶克引用荷爾德林的話所說，「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這是我們大陸背景移民所經歷過並深諳的道理。如今，我們不再著迷於那些欺騙的宣傳，即便有俄烏戰爭和哈以衝突，縱使有東西方的各種競爭和博弈，我們都會選擇維護正義，批判邪惡；我們一定會為了新建的信仰而堅守一生，因為我們正行走在一條通向自由的路

上。

是挽歌，是控訴，也是未來的揭示——從沈嘉蔚巨作《巴別塔》談到「習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何與懷

（接上期）格瓦拉犧牲後的一些細節永遠都在沈嘉蔚的心頭縈繞：他躺在一所鄉間醫院的水槽上。修女們洗淨了他佈滿槍眼的身體與污垢的頭髮。他的樣子就跟曼坦納名作《哀悼基督》相似，修女們也全都驚奇如看到耶穌再世。一個CIA軍官用手合上格瓦拉的雙眼，但雙眼再度睜開，此後一直惘然地看著前方。沈嘉蔚聽到一個聲音在呼喊：「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沈嘉蔚是如此地感動。多年之後，在《第三世界》這幅歷史畫中，他在格瓦拉身上幾個部位畫了與耶穌同樣的傷口。這個暗示很明白：格瓦拉在個人人格上是高貴的。沈嘉蔚還在格瓦拉的擔架上放了一本《堂吉珂德》。他覺得，從許多方面說，格瓦拉都是一個當代的堂吉珂德。

沈嘉蔚還記得，格瓦拉死後六年，1973年，在智利上演的一出悲劇又一次讓他一個熱烈擁抱革命理想主義的年輕紅衛兵畫家傷透了心。阿連德是格瓦拉的摯友。但他不贊成暴力。他希望通過和平的議會道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然而，他何曾想到，他也會與格瓦拉一樣，悲壯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被叛黨的智利士兵的機槍子彈打得百孔千瘡支離破碎。一個是衣衫襤褸的叛亂分子，企圖推翻現存政府；一個是民選總統，坐在富麗堂皇的國會大廳裡，然而面對的竟是同樣的法西斯軍人的槍口，而操縱這些軍人的都是同一個力量CIA，而這個CIA聽命的又竟是一個號稱以反對共產主義暴政為己任，以捍衛民主自由為天職的美國政府。接著，世界上許多國家為這位殉職的元首下半旗誌哀，然而文革中的中國政府拒絕這樣做，而且立刻把馬克思主義者阿連德政府的大使趕走，並馬上接納法西斯獨裁將軍皮諾切特的代表。這是多麼辛辣的諷刺！一切都難以理解！一切又事出有因！沈嘉蔚感到許多歷

史事件的荒謬。格瓦拉和阿連德早已作古。這一切應該都已經過去了。但是，這一切卻又沒有過去。許多立志改變現狀者追隨格瓦拉精神，而且還是其中最為可怕的部分！沈嘉蔚痛苦地看到：身穿印有切·格瓦拉頭像領衫的恐怖分子正在被他們劫持的飛機上殺害平民，或身懷炸彈與以色列軍乘坐的公共汽車同歸於盡……一些恐怖分子可能確是格瓦拉的真誠追隨者。但問題也正是出在這裡。不，這不是基督精神，如果基督精神是真理、正義、博愛的代名詞。並非所有以肉體痛苦以至死亡為代價來實現其目標與信仰的獻身精神都是基督精神，都代表真理！不。人類的解救絕對不是同歸於盡！

那麼，切·格瓦拉的拼死奮鬥又意義何在呢？沈嘉蔚對格瓦拉的共產主義革命事業發出了根本性的疑問——也許格瓦拉一開始就錯了！作為一種政治姿態，沈嘉蔚對格瓦拉所代表的暴力革命道路不能不持否定態度……



沈嘉蔚名畫：《1966北京苦鬥》。

沈嘉蔚更長時間地向北望去。萬里之外是他的祖國，那裡曾經讓他青春燃燒，燃燒得奇形怪狀。

最令沈嘉蔚刻骨銘心悔恨不已的是文革中那場親身參與的武鬥。那是1968年1月一個晚上，一場武鬥開始。沈嘉蔚看到自己當時一個真誠的以革命者自許的熱血青年的樣子。他加入他一派紅衛兵攻擊對方，受傷後，又取了藤帽與長矛再回到戰場。當時敵方只剩最後幾十人，爬到了劇院屋頂上不投降，已有兩個從屋頂上滾下來摔死了。沈嘉蔚躍身鐵梯攀住屋頂，翻身而上，說服對方下去投降。

但沈嘉蔚跟著一下到鐵梯上便驚呆了：剛才縮在鐵梯上不敢上房的戰友，現在正在夾道爭先恐後勇猛地痛打投降的敵方同學。一幕慘烈的景象讓他極其震動。武鬥結束後，沈嘉蔚當初在屋頂上大喊「我們勝利了」時的心情早已一去不復返，他深感自己的淺薄。直到這一夜之前，沈嘉蔚還是一個單純的學生，篤信自己是光榮的共產主義革命事業接班人，以為他們代表正義，是毛主席的好學生。這一夜，



本文作者攝於沈嘉蔚名畫《1972年步畫圖》。

沈嘉蔚看到了「自己人」並不比敵方好到哪裡去。尤其是領悟到人性醜惡的一面——雖然「人性論」在當時是被否定的。

沈嘉蔚很慶幸。自己雖然充好漢加入武鬥隊伍，還沒有被卷入到用刀槍對刺的境地，沒有直接的血債。但是，自己的罪責難道盡止於此嗎？沈嘉蔚深深內疚：自己戴過紅袖章，舉手高呼口號，只要自己跟了「偉大領袖毛主席鬧革命」，自己就是一個從犯。他覺得他的罪責，與希特勒的衝鋒隊員相比，不如下他。他寫下：

1968年1月15日血腥之夜，是我人生最早的轉折點。此後我不再關心打打殺殺的政治，開始了專業畫家的生涯。

沈嘉蔚後來又經歷了許多事件。其中特別是「六四」事件，和平示威者被屠殺，學生民主運動被殘酷鎮壓，又一次讓沈嘉蔚心靈遭受莫大的震動。

他對看到的革命和親身參加的革命不斷進行反思。他看到了事物的複雜性，有時很迷惘，甚至悲觀，但他總算明白了一個基本的觀念：如果這個革命帶給人民的是災難，如果反抗專制暴政的革命卻是以更為殘暴更為專制的統治代替之，那麼，它就應該被否定。

的確，當手段本身在道義上與目的背道而馳時，目的是永遠不會達到的。每一個在前共產主義政權下生活過的人都明白：不能用皮鞭把人趕上「天堂」。共產主義運動最大的荒謬在於它試圖通過血腥鎮壓與思想鉗制來創造一個它宣稱的幸福未來世界。

也許人們要經過許多年後才會醒悟，也許人類還要付出許多慘痛的代價，也許人性中的惡會使一切反復循環，沒完沒了。但無論如何，沈嘉蔚確認自己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一個人道主義畫家。（未完）